

北京史学论丛

2015

BEIJING SHIXUE LUNCONG 2015

主编◎王岗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北京史学论丛

(2015)

王 岗 主编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史学论丛. 2015/王岗主编.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16. 2

ISBN 978-7-80256-638-5

I. ①北… II. ①王… III. ①北京市—地方史—文集
IV. ①K2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13721 号

责任编辑: 陈赫男

封面设计: 新吉乐夫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100006)

网 址: www.qypublish.com

自营网店: <https://qycbs.tmall.com> (天猫旗舰店)

<http://qycbs.shop.kongfz.com> (孔夫子旧书网)

<http://www.qypublish.com> (群言出版社官网)

电子信箱: qunyancbs@126.com

联系电话: 010-65267783 652638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

印 刷: 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23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256-638-5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北京史学论丛》(2015)

编委会

顾 问 王学勤

主 编 王 岗

副主编 吴文涛 刘仲华

编 委 孙冬虎 郑永华 章永俊

王建伟 赵雅丽 许 辉

张艳丽 高福美 程尔奇

目 录

北京城市模式变迁述略	王岗 (1)
政治塑造北京：改朝换代之下的城市命运	孙冬虎 (10)
历史为什么选择金中都	
——简论金中都的历史地位及作用	吴文涛 (23)
唐后期幽州藩镇军乱探略	许辉 (36)
辽南京与金中都的中原文化情结	靳宝 (46)
金元州治城市司候司行政管理机构及其演变	韩光辉 王洪波 刘伟国 (56)
明代北京城市文化生活述略	董焱 (65)
元代《赵孟頫题〈万柳堂图〉诗》考实	郑永华 (78)
明清北京皇城的历史演变及文化意蕴	程尔奇 (86)
清代前期京城的粮商	邓亦兵 (94)
清代中轴线主要建筑的修缮与定型	刘仲华 (104)
嘉庆年间关税改革略论	高福美 (120)
晚清政府的一次救市	
——以“庚子之变”中“四恒”钱庄为中心的考述	张建斌 (127)
《恽毓鼎澄斋日记》的晚清京师城市生活史料价值	张艳丽 (135)
重温京畿名士张佩纶在奇荒中的建言与驳议	赵雅丽 (144)
北京都市空间中的历史文脉传承	王建伟 (158)
“自治”还是“国中之国”	
——以英美法与中国法关于上海公共租界	
“永租制”解释之差异为中心	何岩巍 (172)



从六国饭店看近代北京公共空间之演变	李扬 (181)
试析吴稚晖和勤工俭学生的关系	陈清茹 (196)
北京古代手工业发展因素探析 (续)	章永俊 (207)
关于古村落研究和保护问题的几点思考	尹钧科 (218)
北京古村镇保护模式初探	朱永杰 韩光辉 (224)
扩展保护范围, 加强协调机制	岳升阳 (234)
从王平镇村庄谈古村落保护利用	
——兼谈“古村不古”现象的原因及对策	安全山 (241)
长辛店古镇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策略研究	李自典 (249)
传统村落: 为什么保护? 怎样保护?	
——关于当前保护传统村落正当性和方法的思考	张勃 (254)
村落保护: 关键在于激活人心	罗德胤 (268)
北京古村镇保护与利用模式及机制的新探索	
——中国古村镇保护与利用学术研讨会综述	靳宝 (275)

北京城市模式变迁述略

王 岗

北京城市模式经历过几次变迁，第一次，应该是在燕国灭蓟国，迁都蓟城之后，但是迄今为止尚无考古资料加以印证。第二次，是金海陵王迁都燕京，扩建金中都城，这次的扩建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模式。第三次，是元世祖新建大都城，不仅城址发生巨变，城市模式也彻底改变了。第四次，是明成祖定都北京，城市格局有了微调，而城市模式却出现较大变化。这个变化，一直延续到明世宗时才使城市模式基本定型。第五次，是清世祖定都北京，这时的城市模式也只是微调，但是城市人口发生巨大变化，从而对城市空间的变化产生巨大影响。



现在人们在谈论北京城市的产生时间时，主要依据的是考古工作者对西周燕都的发掘遗址，从而推断北京建城已有三千多年历史。但是，这个推断是有商讨余地的。西周时期燕国的建立，是因为周武王分封诸侯，把召公奭分封在燕地，才建立燕都。历史文献记载称，武王灭商之后，“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①。从顺序上来讲，是先分封的蓟国，后分封的燕国。

另一条历史文献记载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封殷之后于宋，

^① 《史记》卷四《周本纪》。



封王子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①在这里，分封的对象和分封地略有不同，但是分封的顺序是一样的，蓟国是第一批分封的诸侯国，而燕国则是以后分封的。

我们如果再进一步分析可知，蓟国应该就是以蓟城作为都城的，在武王分封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武王对异姓诸侯的分封，实际上只是承认他们在西周的合法地位，而没有给予其他特别的好处。而分封燕国的意义显然不同。第一，燕国是西周的宗亲，来到燕地的目的是为了统治这里，并抵御外敌的侵扰。从时间顺序排列，蓟国在分封之前就存在了，只是得到周朝的承认。而燕国是在受到分封之后，从陕西或者河南赶到燕地来，再建造琉璃河的燕国都城。

至于召公奭在受到分封之后，什么时间派遣他的子孙来到燕地，历史文献没有明确记载，但与受封之时在时间上是有一些距离的。而不论是黄帝的后人，还是尧帝的后人，什么时间在这里建造了蓟都，是黄帝时还是尧帝时，也没有明确记载。但是，蓟都建造的时间要早于燕都则是可以确定的。因此，谈到北京建城之始，以武王灭商的时间来作为起点肯定是不合适的。

自西周分封蓟国和燕国之后，历史发展的轨迹偏向于燕国，燕国日益强盛，蓟国逐渐衰落，最终燕国灭蓟，成为“战国七雄”之一。但是，燕国何时灭蓟、又何时从琉璃河的燕都迁到蓟城、作为新的都城？这一系列的历史变迁，都没有历史文献的记载。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琉璃河的燕都有着明显被河水冲毁的痕迹。

第一种可能，是燕国迁都蓟城之后，废弃的燕城被河水冲毁。第二种可能，是燕国民众从外面（陕西或河南）迁到这里之后，选择在琉璃河建造都城，但是，随着北京水系的自然变化，琉璃河燕都不断遭受河水冲击。燕国人虽然加以抵御，却成效不大，不得不在攻灭蓟国之后迁都于蓟城。笔者认为，第二种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至于蓟城的模式是怎样的，今日已经不得而知。蓟国是异姓诸侯，建造都城有自己的模式，而燕国是西周的宗藩，要建造都城必须合乎西周建造都城模式。在燕国占据蓟城后，一种可能是维持原来的城市模式，另一种可能则是按照西周的礼法制度加以改造，使改造后的蓟城变为比较标准的诸侯国都城模式。如果燕国灭蓟是在西周时期，这种改造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因为这时的礼法制度比较严格。如果燕国灭蓟是在东周以后，周朝已经处于礼崩乐坏的状态下，这种

^① 《史记》卷二十四《乐书》。



改造的可能性就会小一些。自秦汉至辽代的蓟城（辽又称南京），应该保持着燕国迁都之后的城市模式。

二

关于金海陵王迁都之前的蓟城，经过多年来专家学者的研究，以及历史文献的记载，已经可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据《辽史》记载：“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衡广一丈五尺。敌楼、战櫓具。八门：东曰安东、迎春，南曰开阳、丹凤，西曰显西、清晋，北曰通天、拱辰。大内在西南隅。皇城内有景宗、圣宗御容殿二，东曰宣和，南曰大内。内门曰宣教，改元和；外三门曰南端、左掖、右掖。左掖改万春，右掖改千秋。”^①

这座城市的模式有点特别。其一，中国古代的大多数城市皆为每面三座城门，一正两辅，而辽南京为每面两座城门，这种模式就使得全城被分为“井”字形，没有了贯穿全城的中轴线。其二，这座城市的中心，也就是《辽史》中所称的“大内”也不是在全城的中心位置，而是偏在西南隅。有一点应该说明，这里的“隅”不是角落的意思，而是一种区划，西南隅也就是西南区，西南隅的东北角应该是在全城的中心位置。当时的辽南京也应该是分成四个区，即四个隅，即东北隅、东南隅、西北隅和西南隅。

因为在辽朝占有辽南京之前，先秦这里是燕国的首都，汉代这里曾经是燕王的住地，唐代这里曾经是节度使的衙署，故而有独特的建筑，如先秦燕国和汉代燕王的宫殿等。但是，这些建筑到唐代应该都取消了。而辽代在把这里升为陪都南京之后，又恢复了一些皇宫建筑，故而被称作“大内”。此后，金海陵王建造金中都的皇宫，有些就利用了辽朝的宫殿建筑。

对于这座很有特色的陪都，金海陵王在迁都时进行了极大的改造。显然，陪都的模式是没有办法和首都相比的。而金海陵王在改造辽南京时又是以当时中国最壮丽的都城——北宋东京城（今河南开封）为仿照蓝本的。这时的中国古代都城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发展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想都城模式，而北宋东京城就是当时这种理想模式的范本。宋东京城是三层城市叠加而成，最外面一层是都城，中间一层是皇城，最里面一层是宫城。这种模式已经对汉唐时期的都城模式进行了极大的改建。

^① 《辽史》卷四十《地理志》。



金海陵王迁都，以北宋东京城为蓝本建造新都城，确实具有前瞻眼光。当时金朝的文化发展程度要落后于宋朝，所以在许多方面都积极地向宋朝学习。这时的北宋东京城已经被金朝占据，因此，要学习这个当时最理想的都城模式是很便利的。金天德三年（1151）四月，“有司图上燕城宫室制度，营建阴阳五姓所宜”^①。这里的“阴阳五姓”应该是“阴阳五行”之误，到了辽宋金时期，人们开始越来越重视阴阳五行在建造住宅、墓地等方面的因素及影响。而所谓的“燕城宫室制度”，实际上指的是从开封绘制回来的宫室模式，也就是从学习过程中所得到的模式。

为了落实这个新的理想都城模式，必须对现有的燕京城进行大规模的改造。第一，是扩大都城的空间面积。而在扩展城市面积的同时，也就增加了城门的数量。史称：“（天德三年）三月，命张浩等增广燕城。城门十三，东曰施仁、曰宣曜、曰阳春，南曰影风、曰丰宜、曰端礼，西曰丽泽、曰颢华、曰彰义，北曰会城、曰通玄、曰崇智、曰光泰。”^②显然，经过城市面积的拓展，每面由原来的两座城门增加为三座，这才有了全城的中轴线。此外，都城北面为四座城门，显然也是考虑到了阴阳关系。南面属阳，城门为单数；北面属阴，城门为双数。但是，在北面四门中，仍有一门与南面中间的城门相对，使中轴线贯穿整个都城。

第二，在扩大都城空间的时候，注意到了全城格局的平衡问题。在原来的燕京城里，大内没有放在全城的中心位置，这种模式与北宋东京有着较大差距。为了弥补这个差距，海陵王在扩展中都城时，北面城墙基本不动，东面扩展的范围也不大，而着重扩展了南面和西面的城墙。经过这种有选择方向性的扩展，原来辽南京的大内竟然神奇地移动到全城的中央位置。

海陵王在建造金中都城时，不仅宫殿的格局与北宋东京大致相近，而且皇家园林也与北宋的都城大致相同，甚至连一些亭台楼阁的名称，也与北宋东京的皇家园林相同。这座新建的金中都城完工之后，成为当时整个中国最壮丽的都城之一。其奢华程度，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北宋的东京城。作为少数民族帝王建立的都城，正是因为虚心学习中原王朝的先进文化模式，才能够取得骄人的成就。

① 《金史》卷五《海陵纪》。

② 《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



三

金朝末年，元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自草原崛起，并且很快就攻占了金中都城。但是，蒙古国的主力随即发动大规模的西征，铁木真也在回师途中病故于银川。此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蒙古国的重心一直都在漠北草原。只是在元世祖忽必烈夺得皇权后，才把注意力放到了中原和江南地区。经过多年征战，终于攻灭南宋，元朝遂一统天下。

忽必烈在攻灭宋朝的过程中，建立元朝，定鼎大都，开始在燕京城东北的旷野之上建造一座新都城。这座新建的都城，由忽必烈的谋臣刘秉忠加以规划设计。刘秉忠是一位奇才，早年当过政府的小吏，又入山修习道教，最后皈依佛门，以高僧的身份成为忽必烈身边的幕僚。功成名就之后，忽必烈又命他还俗为官。因此，刘秉忠集儒、释、道三家学术精华于一身。在他的主持下规划和建造的大都城，展现出全新的都城模式。

这座大都城的第一个特点，是把鼓楼和钟楼放在全城的中心位置。刘秉忠在规划大都城的城址位置时，曾经设立了一个全城的中心点，并建造了一处中心台。时人称：“中心台在中心阁西十五步。其台方幅一亩，以墙缭绕。正南有石碑，刻曰：中心之台，实都中东、南、西、北四方之中也。在原庙之前。”^① 在这里讲了两个坐标，一个是中心台，一个是中心阁。中心台在西，中心阁在东。

时人又称，昭回坊“前有大十字街。转两大都府巡、警二院，直西则崇仁倒钞库，西中心阁。阁之西齐政楼也，更鼓譟楼。楼之正北，乃钟楼也”^②。在这里，又多了几个坐标。自东往西，是巡、警二院，然后是崇仁倒钞库，是中心阁，是齐政楼（鼓楼），鼓楼北面是钟楼。在这里，没有提到中心台，却提到了崇仁倒钞库和鼓楼、钟楼。据此可知，这几处地方都是在钟鼓楼的东侧。

《析津志》还称：“钟楼：京师北省东，鼓楼北。至元中建，阁四阿，檐三重，悬钟于上，声远愈闻之。”“钟楼之制，雄敞高明，与鼓楼相望。本朝富庶殷实莫盛于此。楼有八隅四井之号。盖东、西、南、北街道最为宽广。”^③ 后人又称：“钟楼在金台坊，东即万宁寺之中心阁。”^④ 在这里，以钟楼为主坐标，标

① 《析津志辑佚》，又见《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四所引《析津志》，文字略有不同。

② 《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四引《析津志》。

③ 《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四。

④ 《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四引《图经志书》。



明了鼓楼、万方寺、中心阁的位置。而据描述,鼓楼和钟楼是建在全城中心位置的。

在元大都之前的中国古代都城,都是把鼓楼和钟楼放在皇城前面,东、西相对,表明钟楼、鼓楼只是皇城的附属设施,而皇城所代表的皇权才是至高无上的。元大都的设计者则是把钟楼、鼓楼放在全城的中心位置,表明上天(宇宙)的运行规律(天道)才是至高无上的。鼓楼在当时被称为齐政楼,也表明了地上的社会运行规律(人道)要遵循上天的运行规律。这个思想,是以前的汉唐时期所没有的,到了辽宋金时期,人们虽然已经有了这个思想,却还没有落实到都城模式的实践中来。

大都城的第二个特点,是建造的都城中轴线没有贯穿全城,而是从都城正南门丽正门一直向北延伸,穿过皇城的正殿大明殿、延春阁一线,而到达全城的中心点钟鼓楼。这种中轴线的设计和建造,也是此前中国古代的都城模式中所没有的。从全城布局的角度来看,刘秉忠在元大都的规划中加入了阴阳的观念,南面为阳,故而设置了三座城门,而北面为阴,则设置了两座城门。位于城中心的钟楼、鼓楼,则是阴、阳两种文化的分界点。因此,从这里往南是奇数,自然有居中的中轴线,两侧对称。而从钟楼、鼓楼往北是偶数,就不能设置中轴线。即使为了交通方便而修建了一条鼓楼大街,也必须要避开中轴线的位置,这样才能够与阴阳观念相符合。

这条从丽正门到钟楼、鼓楼的中轴线,还有第二层文化内涵,就是把皇城放在了中轴线的中央位置。从全城的角度来看,中心位置被钟楼、鼓楼占据了,没有再设置皇城的空间。但是,从中轴线的角度来看,皇城就变成中心的位置。许多重要的相关设施,如官僚衙署、礼制坛庙、祭祀寺观等,就都是以皇城为中心来设置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围绕皇城的京城文化圈。

元大都城的中轴线设置,还有第三层文化内涵,就是把皇城和钟楼、鼓楼的关系加以重新调整。以前的钟楼、鼓楼是皇城的附属设施,但是,元大都的钟楼、鼓楼却建在了皇城的北面,形成了更加尊贵的态势。钟楼、鼓楼对皇城是南面而视,有种居高临下的意味,而从皇城北看钟楼、鼓楼,又会有一种仰望天庭的感觉。当然,自古以来的儒家学说都把皇帝说成是上天的儿子,故而又称“天子”,面对代表上天的钟楼、鼓楼,而降低皇帝的地位完全符合儒家政治学说的观点,也为帝王取得合法的政治地位提供了物化的模式。

大都城的第三个特点,是实现了《周礼·考工记》中“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都城理想建造模式。这部书源自先秦,成书于秦汉时期,是儒家建造都城



学说的理想模式。但是，自秦汉以来的都城规划和建造者皆没有能够完全实现这个理想。而刘秉忠设计的元大都，则全面落实了这个理想模式。在大都城的南部建造的皇城，落实了“面朝”的理想，让进入都城的人们，首先就看到了宏伟高大的皇宫，给人们带来视觉上的震撼。而在皇城的后面，即钟楼、鼓楼一带，则设置了大量商市，落实了“后市”的理想，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重要经济政策。当然，这种设置也有一些积极的因素。钟楼、鼓楼是在全城的中心，在这里设置大量商市，给全城居民的商业活动带来了便利。

在以往的都城模式中，太庙往往占据重要的位置，被设置在皇城的左前方，即《周礼·考工记》所谓的“左祖”。但是，对社稷坛的设置，却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从而在大都城建造之前的许多重要古都，都没有实现“左祖右社”的文化模式。而在刘秉忠设计的元大都，第一次落实了“左祖右社”的都城模式。元大都的太庙建在齐化门（今朝阳门）里，正是皇城的左侧。而社稷坛则建在平则门（今阜成门）里，正是皇城的右侧。在元代前期，人们也有着重视太庙而轻视社稷坛的观念，故而在建造大都城的过程中，就完成了太庙的建造。而对社稷坛的建造，则是在大都城建好以后的事情了。

大都城的第四个特点，是在皇城的建造中体现出大量游牧文化的特色。其一，是宫殿群围绕太液池建造，体现了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习俗。在元大都的皇城里，世祖忽必烈在太液池东岸建造了皇宫正殿大明殿，在大明殿后面又建造了皇后居住的延春阁。而在太液池西岸则建造了皇太子居住的东宫。到元武宗时，又在太液池西岸皇太子宫的后面建造了兴圣宫，以供皇太后居住。四组建筑环绕太液池，而使太液池成为整个皇城的中心。

其二，在皇宫正殿大明殿的里面，格局为皇帝和皇后并列在一起的模式，而不是中原王朝只设皇帝一个宝座的模式。只设一个宝座，所显示的是帝王独尊的政治主题。而皇帝和皇后并列，所显示的则是皇亲贵族共同执掌国家大政的游牧习俗。从元太祖铁木真建立蒙古国开始，每位帝王在登基时都要召开蒙古贵族的“忽里台”大会，由众多贵族共同推举帝王，才有合法的地位。这个制度与帝、后并列的模式有着共同的政治含义。

其三，在皇宫的布置方面，也体现出游牧生活的习俗特点。蒙古族民众生活在大草原上，随处安居，在帐篷（俗称蒙古包）里要铺设毡毯，以阻隔地下的潮气对人们身体的伤害。但是，在大都建造的宫殿里面，蒙古帝王也要铺上毡毯，以适应自己的生活需求。此外，在大草原上的帐篷保温功能比较差，冬天往往需要挂些兽皮保暖。但是在大都城的宫殿里有着良好的取暖设施，帝王们仍然



习惯冬天在墙壁上挂一些兽皮。这种行为，主要不是保温，而是再现大草原的生活场景，以及习惯了的生活感受。

四

元朝末年，朱元璋率农民起义军推翻元朝，建立明朝，定都南京。与此同时，取消了大都城的政治中心地位，改称为北平府。一方面，是派遣大臣来到北平，将元朝的皇宫拆毁，以消除前朝的王气。另一方面，是把大都城整个加以压缩。有的专家认为是便于军事上的防御，笔者则认为是与拆毁皇宫同样的目的，就是降低大都城的规制等级。作为普通城市，是不能有大量空间的。与此同时，朱元璋又分封皇子朱棣为燕王，镇守北平，以防元朝残余势力卷土重来。

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允炆即位，采取“削藩”之策，逼迫燕王朱棣起兵造反，对抗朝廷，史称“靖难之役”。双方争斗的结果是朱棣夺得皇权，朱允炆不知所终。明成祖朱棣登基后所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把北平改为北京，并且开始举全国之力对北京加以改造。因为前面已经有了南京城的建造，故而朱棣没有采取新的模式，而是仿照南京的样子在北京建造宫殿园林。

经过新建的北京城，出现了一种与元大都完全不同的都城模式。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取消了游牧文化的因素，恢复了农耕文化独尊的局面。第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宫城与园林的明确分离。在元大都的皇城里，宫殿是围绕太液池建造的，即宫殿与园林是融为一体的。而在明代新建的皇城之内，宫城（紫禁城）建造在太液池东岸，与园林完全分开，以太液池为中心的皇家园林被称为“西苑”。这种做法与此前宋金时期的都城模式是一样的。

第二个重要的变化，是紫禁城内出现了内外有别的文化模式。在原来的元大都皇城里，没有严格的内外之别。皇帝走到哪里，近侍和大臣也跟到哪里。而在新建的明代紫禁城里，开始出现外朝和内廷的严格区分。外朝即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文华殿、武英殿五大殿（包括内阁），是帝王和大臣处理政务的场所。而内廷即乾清宫、坤宁宫及东六宫、西六宫（包括交泰殿），则是帝王和后妃、皇子们日常生活的场所。所有的大臣和侍卫是不能进入内廷的。这种内外有别的模式，也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同的一种突出体现。

第三个重要的变化，是更加突出了皇家坛庙在中轴线上的位置。在元大都虽然第一次完成了“左祖右社”的设置，但是，太庙和社稷坛是放置在皇城的两侧，地位还不够突出。而在明代的北京城里，太庙和社稷坛被放置在皇城之内、



紫禁城前面的位置，太庙在左，社稷坛在右。人们只要走进皇城，首先就会看到东面的太庙和西面的社稷坛。这不仅提升了太庙和社稷坛的地位，更加突出了农耕文化的主题。

第四个重要的变化，是在新建的北京城进一步延伸了中轴线的长度。原来的元大都中轴线，是从钟楼、鼓楼到丽正门一线。而明代新建北京城时，一方面向南拓展了南面城墙，使得皇城前面的空间更加宽广。另一方面，又在都城正南门（俗称大前门）外建造了郊坛和先农坛，这两座坛庙位于中轴线两侧，相互对称，把北京城的中轴线进一步向城外延伸。

明世宗扩建南城，又把这两座坛庙包入城内，在中轴线上又建有永定门，这时才最终形成了从永定门到钟楼、鼓楼的7.8公里的北京明清中轴线。此后，清朝也定都北京，都城模式没有再发生大的变化。值得一提的是，明世宗在扩建北京南城的时候，又在礼制建筑方面进行了改革，把郊坛分为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四坛，天坛占据郊坛的位置。然后，在城东的朝阳门外建造日坛，在城西的阜城门外建造月坛，在城北的安定门外建造地坛，形成四坛分占北京四面的格局。就中轴线而言，又多出日坛与月坛对称的文化格局。

就都城整体模式而言，大致上是明代沿袭元代，清代沿袭明代。而明代对于元代在城市格局上出现微调。明代洪武初年，北面城墙向南压缩。到永乐年间，南面城墙又向南扩展。这种城墙的变动，使得整个北京城都向南迁移。而迁移的结果是使得原来位于全城中心位置的钟楼、鼓楼不再是全城的中心，而原来偏在南面的皇城却逐渐移向全城的中心位置。这也显示出明代皇权的地位比元代有了很大提高，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更加巩固。

综上所述，北京城市的模式变迁经历了几千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明的发展出现了多次变化，而这些变化，是能够通过都城模式变迁体现出来的。自明清以来的北京城，正是中华文明的集萃结晶，从紫禁城到颐和园，从天坛到太庙，从王府到胡同四合院等，这些中华民族世代创造的宝贵文化遗产能够保留到今天是很不容易的。今后的保护，更加不容易。中华文明的发展一定是以文物遗存为依据的，北京城就是中华文明辉煌的见证。

（王岗：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政治塑造北京：改朝换代之下的城市命运

孙冬虎

历史上的北京城从西周燕都蓟城发展到汉唐军事重镇幽州，辽金时期再变为北方区域政权的陪都或首都，元、明、清三朝进一步成为统一国家的首都，民国至今也基本连续地保持着国家政治中心的地位。政治中心是北京近千年来最核心的城市功能和最突出的城市色彩，决定北京城市发展方向的首要因素是政治中心独有的无比强烈的政治驱动。伴随着以往的多次改朝换代，尤其是近现代的政权更迭，以城市布局与建筑存废为主要象征的北京城市命运几度起伏变幻。政治因素对北京的塑造优劣互见，也势必继续左右城市发展的未来运行轨迹。

一、政治中心的形成：备受垂青的历史命运

正如清初顾祖禹指出的那样，北京的自然条件并不适合作为国都。以气候状况与地方物产衡量，“苦寒沙碛之地，莫甚于燕”。就地理位置及其影响下的军事形势而言：“以燕都僻处一隅，关塞之防，日不暇给；卒旅奔命，挽输悬远。脱外滋肩背之忧，内启门庭之寇，左支右吾，仓皇四顾。下尺一之符征兵于四方，恐救未至而国先亡也；撤关门之戍以为内援之师，又恐军未离而险先失也。甚且借虎以驱狼，不知虎之且纵其搏噬；以鸟喙攻毒，而不知鸟喙之即足以杀身也，不亦悲哉！”^①在这样的背景下，先秦时期的蓟城仅是列国之一燕国的都城，汉唐幽州也只是以中国北方的军事重镇闻名。虽然苏秦说燕国“地方二千余里”“此所谓天府也”^②，但这只是纵横家的政治鼓动之言。从商周到辽代之前，国家的政治中心与今北京地区无涉。元末明初陶宗仪称大都“右拥太行，左注沧海，

① [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直隶方輿纪要序”，中华书局，1955。

② 《战国策》卷二十九《燕一》《苏秦将为从》，岳麓书社，1988。



抚中原，正南面，枕居庸，奠朔方。……壮哉帝居，择此天府”^①。与此类似，明末清初孙承泽说北京“诚万世帝王之都”^②，康熙《大兴县志》又称北京“岂非古今第一形胜哉”^③！显然，关于北京地理形势的这些评说，是在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业已成为全国首都之后的褒扬，几乎等同于为三代帝王之所以选择在此建都所做的合理性、必然性论证，因而基本不会或不敢提到北京地理环境的劣势。

但是，自然条件只是为风云人物的活动提供了空间舞台，对于这些环境因素的优劣评价则因人而异。无锡人顾祖禹眼中苦寒偏僻的燕京，在塞外以游牧骑射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各民族看来却是理想的建都之地。后晋割让给契丹的幽蓟十六州虽然分布在偏离中原腹地的长城内外，但在辽国境内已属经济最富庶、文化最发达的区域。金朝天德二年（1150）七月，有意迁都的海陵王询问，为什么自己种的二百株莲花都不能成活？早已揣摩上意的右丞相梁汉臣回答：“非种者不能，盖地势然也。上都地寒，惟燕京地暖，可栽莲。”兵部侍郎何卜年亦称：“燕京地广土坚，人物蕃息，乃礼义之所，郎主可迁都。北番上都，黄沙之地，非帝居也。”海陵王随后下诏征求建议，“内外臣僚上书者，多谓上京僻在一隅，转漕艰而民不便，惟燕京乃天地之中，宜徙都燕以应之，与主意合”^④。金上京故址在今黑龙江阿城市南部的白城，两相比较，燕京就成了气候温暖、位置适中、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文化发达的通都大邑。为了南下问鼎中原，金朝也需要把政治中心从偏远的长城以北南移，燕京因此成为首选之地。此后，建立元朝与清朝的蒙古人和满洲人，分别来自西北大草原与东北平原。在新的国家版图下，大都（北京）仍然以相对温暖的气候条件、南北适中的地理位置成为国家首都，其发达的交通驿路和漕运系统弥补了国都过于偏东以及周边物产相对贫瘠的缺陷。

中国历史大转折中的因缘际会对北京格外垂青，使它几度获得了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宝贵机遇，执政者因此能够以最大的政治力量按照自己的意图塑造这座城市。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战争主要是南北战争，笼统地讲，就是大致以长城一线为分界的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之上诞生的政权之间的战争，而国家的政治重心长期在黄河流域。从先秦时期位于中原的商丘、安阳、洛阳，转到秦汉

①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一《宫阙制度》，中华书局，1959。

②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形胜》，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

③ 张茂节：《大兴县志》卷一《形胜考》，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

④ 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十三《海陵炀王上》，中华书局《大金国志校证》本，1986。